

# 康门弟子与著述遗存

张纹华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文法学院,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要] 文章既纠正《康门弟子述略》著录的若干失误,也弥补其相关著录过于简略的不足。与此同时,笔者不仅全面分析、深入研究康门弟子的地域来源、维新事业、知识结构与著述遗存,而且,笔者始终将康门弟子与其同时期的简氏门人进行联系比较,以此窥见广东学人与学术近代转型的具体路径,以期对20多年来的康门弟子研究作出一定的推动。

[关键词] 康有为;康门弟子;地域来源;知识结构;著述遗存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3-0068-07

与朱次琦门人、简朝亮门人研究不相同,康门弟子研究在1972年、1991年分别产生《康有为主持下的万木草堂》<sup>[1]</sup>、《康门弟子述略》<sup>[2]</sup>(以下简称《述略》)等重要成果。2011年黄明同《草堂万木森变法维新政——康有为和他的弟子》<sup>[3]</sup>(以下简称《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中的康门弟子姓名、字号、籍贯及事迹列表是以《述略》为参照的。在此基础上,笔者既纠正《述略》著录的若干失误,也弥补其相关著录过于简略的不足。与此同时,笔者不仅全面分析、深入研究康门弟子的地域来源、维新事业、知识结构与著述遗存,而且,笔者始终将康门弟子与其同时期的简氏门人进行联系比较,以此窥见广东学人与学术近代转型的具体路径,以期对20多年来的康门弟子研究作出一定的推动。

## 一、《康门弟子述略》补正

即使过去20多年来康有为研究取得较大发展,但由于史料所限,康门弟子研究仍然难以超越《述略》所奠定的研究高度。作为迄今以来唯一一本全面著录康门弟子生平事迹的专著,《述略》无疑是任何一名康门弟子研究者所难以跨越的,但作为首本康门弟子研究专著,《述略》所产生的若干失误以及相关著录的过于简略甚至欠缺等草创性、具有时代性的痕迹,均是难以避免,也是亟需完善的。

### (一)《述略》正误

虽然《述略》殊非传统意义上的目录书,但从著

者旨在最全面地将康门弟子收录其中而既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也实地走访康门弟子的亲属、好友等积极做法,到著述将所收录的康门弟子的姓名都置于“目录”的编排方式,《述略》是自有作为工具书其中一种的目录书的功能的,而准确性恰恰就是工具书最基本的特性。据笔者研阅,《述略》存在以下失误。

1. 目录排序有误。为了让读者第一时间知晓康门弟子在《述略》中的排序,无论是目录,是正文,还是附录中的《康门弟子一览表》,著者都以“(1)、(2)、(3)”或“1、2、3”等序号作为标记,这种做法极其容易致误。如目录第1页著者将“(6)韩文举”误作“(9)韩文举”。

2. 从目录著录到前言所述欠缺一个合理的过渡。《述略》在目录中著录的康门弟子为受业弟子120人、拜门弟子15人与私淑弟子10人,著者在前言第8页中指出,就受业的性质与种类而言,直接受业者182人,拜门者23人,私淑者12人,二者显然并不相符。按:附录中的《康门弟子一览表》是在目录著录的基础上增加至“前言”所指的数量,故著者考查明辨的康门弟子数量如其在“前言”中所述,但从目录著述到前言所述欠缺有一个合理的过渡,即著者必须清晰指出其著述重点阐述的康门弟子为受业弟子120人、拜门弟子15人与私淑弟子10人。

[收稿日期] 2016-12-20

[作者简介] 张纹华(1974—),女,广东南海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史博士后,主要从事广东儒学与广东文学研究。

3. 门人数量统计与籍贯统计有误。如前言第8页,一方面,著者指出《述略》共收康门弟子219人,其籍贯分别如下:广东103人,广西46人,湖南3人,江苏6人,陕西6人,上海5人,日本4人,朝鲜3人,山东3人,浙江3人,江西2人,台湾2人,贵州1人,福建1人,四川1人,待考里爵的29人。若以此计算,康门弟子为218人。另一方面,著者指出,康门弟子就受业的性质与种类而言,直接受业者182人,拜门者23人,私淑者12人,其统计数量也殊非219人,而是217人。如附录200—211页,据著者所录,康门弟子籍贯如下:广东110人,广西48人,湖南6人,江苏9人,陕西6人,日本2人,朝鲜3人,山东3人,浙江4人,江西2人,台湾2人,贵州1人,福建3人,四川1人,湖北1人,待考里爵16人,合计217人。除陕西、朝鲜、山东、江西、台湾、贵州、四川籍康门弟子以外,均与著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数量有误,附录中的康门弟子也没有著者在前言中所指出上海5人。

4. 目录、正文、附录人名著录不一致。如目录第3页第59条“崔达成”,正文第145页、附录第203页均著录为“崔成达”。按:以正文、附录著录为正确。如目录第4页第88条“梁启麒”,正文第159页著录为“梁启麟”,附录第204页著录为“梁启麒”。按:梁启麒,字仲麟,以目录、附录著录为正确。如目录第4页第91条“钟桌京”,正文160页、附录204页均著录为“钟卓京”。按:以正文、附录著录为正确。

5. 正文、附录籍贯著录不一致。正文、附录籍贯著录不一致有二:一是正文、附录皆有著录籍贯,但二者有异。如正文第123页著录林纘统为琼州崖州人,附录第201页著录为广东琼州。按:明清琼州府属广东管辖,故以附录著录为正确。正文第133页著录程大璋为广西桂平人,附录第202页著录为广西浔州。按:桂平市别名浔州,当统一为桂平。正文第149页著录钱维骥的籍贯一为湖南人,一为云南昆明人,附录第203页著录为湖南。正文第159页著录龙赞侯为广西临桂人,附录204页著录为广东临桂人。按:临桂位于广西桂林西郊。正文第186页著录刘绂为上海华泾镇人,附录209页著录为江苏上海。按:华泾镇原名龙华乡,隶属于上海徐汇区,位于上海市中部。二是正文没有著录籍贯,附录则有。如正文第137页没有著录梁秋水的籍贯,附录第202页著录为广西。正文第144页没有著录陈国镛的籍贯,附录第202页著录为广东。正文第158页没有著录罗根的籍贯,附录第

204页著录为广东。正文第162页没有著录刁宸英、梁炳光、梁小山的籍贯,附录第205页均著录为广东。正文第163页没有著录梁子刚、黄为之的籍贯,附录第205页均著录为广东。正文第163页没有著录郑完成的籍贯,附录第205页著录为江苏。正文第164页没有著录梁应骝、梁元理的籍贯,附录第205页均著录为广东。正文第165页没有著录汪凤翔的籍贯,附录第205页著录为广西。按:正文的重要性一般高于附录,而籍贯是人物研究的起点,故有必要置于正文部分。

6. 正文、附录人名著录、籍贯著录有误。正文、附录人名著录,其误有十:正文第131页、附录第202页,陈介叔当作陈士廉。按:陈士廉,字介叔,号大令。正文第133页、附录第202页,程大璋当作程式谷。按:程式谷,又名大璋。正文第147页、附录第203页,张伯荫当作张祖诒。按:张祖诒,字伯任。正文第147页、附录第203页,韩云台当作韩县。按:韩县,字云台。正文第151页、附录第203页,张智若当作张学璟。按:张学璟,字智若。正文第161页翁冰,附录第204页翁冰,按:翁斌,字笃庵,号率平,笔名翁中、翁冰。正文第162页梁炳光、正文第163页梁子刚,附录第205页梁炳光、梁子刚。按:梁炳光,字子刚,故梁炳光、梁子刚为同一人。正文第164页梁元理,附录205页梁元理,按:梁元理即梁铁君。附录第206页陈宜逊,按:当作陈逊宜。正文第186页、附录第209页张鹏一,按:张扶万,字鹏一。正文、附录籍贯著录,其误有二:正文第165页、附录第206页均著录黎尚元为广东灵川人。按:灵川位于广西东北部,由广西管辖。附录第207页张雪峰为广东人,按:当作江苏海州人。

7. 正文记载与史实相违。如正文第36页王觉任,著者既指出王觉任的生年是1860年,也强调王觉任年龄比康有为大一点。按:康有为生年是1858年。

## (二)《述略》拾遗

即使梁启超在康有为70寿辰时有“亲授业者盖三千焉”的寿联,但近100年来康门弟子的数量仍然是在《述略》提供的200多人之间徘徊,且生平事迹较详者亦只约100人。故在康有为研究新史料难有增加的情况下,如何既依靠《述略》本身,也利用方志、人物传记等地方史料,完善《述略》中生平事迹较简略的康门弟子的记载,成为后之研究者的努力方向。

1. 完善康门弟子的籍贯及补其事迹。据《述略》附录的《康门弟子一览表》,康门弟子待考籍贯者16人,其中可考者3人:翁斌(1900—1946),字笃

庵,号率平,笔名翁中和、翁冰,浙江嘉兴人,青年时拜师康有为,后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先后在暨南大学任职,英士大学执教。抗日战争期间,翁斌在上海创办《大英夜报》,在浙江主办《青年日报》,在《阵中日报》工作,著有《为公书》。崔师贯(1871—1941),原名景元,又名其荫,字伯越,一作百越,又字今婴,广东南海人,梁鼎芬之妹夫,著《白月词》,附于其《砚田集》一卷,1934年铅印本,藏于国图。朱通儒,广东南海人,是朱次琦的侄子朱淇的侄子,受朱淇之命在广州创办《华东报》,1898年在广州创办《嘻笑报》,以嘻笑怒骂的方式评论时政。

据《述略》附录的《康门弟子一览表》,康门弟子来自“广东南路”4人,其中,仍可具体考证2人。林绳武(?—1938),字韵宣、韶宫,号醴江居士,广东信宜人,广雅书院学生,1907年廷试第五名。1913年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驻秘鲁领事。1930年任《钦县志》总编纂,并整理冯敏昌《鱼山执笔法》。据《高州府志》,江慎中任高州中学校长时,聘请了周相臣、朱振基、卢易初等高州知府名人执教,故江慎中是广东高州人。

据《述略》附录的《康门弟子一览表》,康门弟子来自“广东”15人,其中,仍可具体考证3人。梁小山,梁鼎芬之二哥,广东番禺人。梁元理即梁铁君,所康有为诗注,为广东东佛山人。张雪峰的儿子是张沧江,张沧江为康同璧秘书,据张沧江《忆康同璧母女》一文,自言:“我是江苏省海州人。海州在江苏省东北角,是一个古老而非常小的县份,是陇海铁路的起点,在海边。”故张雪峰不是《述略》著录的广东人,而是江苏海州人。张雪峰、张沧江、张启桢一家三代用30多年时间完成《康同璧文集》的初稿。

2. 完善康门弟子的生卒年及补其事迹。据《述略》正文,康门弟子或欠生年、或欠卒年,或生卒年皆欠合102人,其中,生卒年可考者4人。据《我史》第5页,罗普(1876—1949),原名文梯,字熙明,号孝高。陈鼓征(1906—?),原籍福建,1924年毕业于吴敬恒创办的上海国语师范学校首届普通科。赵必振(1873—1956),字曰生,湖南常德人,参加院试,补博士弟子员,与邑人何来保等结“寒社”,1900年与何来保组织常德“自立军”,到日本任《清议报》《新民丛报》校对、编辑,翻译出版《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维新慷慨史》《日本人权发达史》,后从事教育工作,执教私立明义中学,编《国学概论》《自立会纪事史料》《自立

会人物考》等。张扶万(1867—1943),名鹏一,字扶万,号在山主人,晚年号一翁、一叟,笔名树叟,著《唐代日本政府人往来长安考》《太史公年谱》《公羊今释》《礼记今释》《诗经今释》《尚书今释》《阿母河考》《孔圣事迹问答》《刘古愚年谱》等。

由于文献欠缺,即使康门弟子研究是康有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除康门十大弟子获得学界高度的关注以外,大批康门弟子其实是甚少进入学界视野的。无论是籍贯、生卒年都是人物研究的起点,以《述略》为基础而存在失误以及相关欠缺,可知康门弟子的基础性研究其实殊非扎实,康门弟子研究亦具有广阔的空间。

## 二、地域来源与维新事业

1891—1898年,康有为开馆广东万木学堂,这是康有为讲学生涯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期间的1894年、1897年,康有为前往广西桂林讲学。1926—1927年,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天游学院,此为康有为晚年授徒。由此构成康门弟子的三大部分与主要地域来源。《述略》附录的《康门弟子一览表》中的“何时何处受业”、“籍贯”亦是以此构建的。与朱氏门人形成的顺德梁氏家族、三水梁氏家族、南海康氏家族等三大门人家族及简氏门人中的阳山黄氏家族分别在朱次琦、简朝亮开馆讲学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同,虽然康门弟子亦有兄弟结伴师从康有为者,并以广东籍康门弟子来说即已经形成新会梁氏家族、顺德麦氏家族、南海曹氏家族、开平张氏家族、顺德罗氏家族、番禺韩氏家族、惠州邓氏家族等7个门人家族,但殊非出自同一家族的门人群体,而是如徐勤、王觉任、韩文举、梁朝杰、梁启超等个体门人极大地推动着康有为的政治与学术生涯,学界对此亦多有论述。既迥异于身处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朱氏门人传统的仕宦人生与旧式的教育生涯,也大异于以旧学作为学术传承第一页的同时代的简氏门人普遍被动地卷入广东社会近代转型而呈现的多变且欠缺系统性的人生轨迹,在康有为旨在发动维新变法的新学引领下,康门弟子不仅在北上与南下、出国与回国之间发动、参与丰富的社会活动与留下丰富的著述遗存,而且形成颇为一致的人生轨迹,标志广东近代新式学人圈乃至中国近代新式学人圈的产生。

### (一) 地域来源

结合对《述略》的正误与拾遗,笔者指出,康门弟子216人,籍贯待考者13人,其中,广东108人,广西50人,江苏9人,湖南6人,陕西6人,浙江5人,山东3人,福建3人,江西2人,台湾2人,四川

1人,贵州1人,湖北1人,上海1人,朝鲜3人,日本2人。既由于康有为在省会城市开馆讲学,更由于康有为在开馆万木草堂期间带领门人至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并为宣扬维新变法而大力办学会、办报刊,甚至派弟子至日本横滨创办大同学校,如此一系列引领广东近代新变的举措使康有为成为广东近代乃至中国近代著名的学人。康门弟子的地域来源自然不会局限于广东一隅而辐射至全国13个省,甚至出现朝鲜、日本的门人,由此呈现迥异于朱氏门人与简氏门人的地域特色。当然,无论是门人数量还是在其学术人生中的重要性,广东门人仍然是康门弟子的中心。

## (二)维新事业

康门师徒的维新事业由下述三期组成:一是1891—1898年,康门师徒以万木草堂为中心,既北上北京、上海,也移步广西、澳门,最终成功发动维新变法;二是1898年冬—1912年,康门弟子或留守广州、梧州、桂林、长沙等,或追随康有为至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坚持维新事业;三是1913年—1927年,流亡在外的康门弟子大多追随康有为回国而以上海、北京作为其大本营,继续为维新信念奔走相告。不仅是整整37年,而且在康有为去世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就是以新式仕宦、讲学生涯、办学会、办报刊、办企业与书局为内容,以广东社会近代化为目标的维新事业将康门师徒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1. 新式仕宦。**应该说,与简氏门人的科场逊色相比,康门弟子还是出现了梁启超、麦孟华、陈荣衮、陈焕章等科场得意者,但是,维新事业不仅使康门弟子没有重走传统仕宦,而且激发他们较高的从政热情,戊戌政变又使康门弟子真正意义上的仕途其实是与清朝覆亡、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勾连在一起的。1913年成为康门弟子返国与踏上新式仕途的重要一年。或出任各省要职,或入幕府,成为康门弟子开始新式仕宦的2种主要方式。龙泽厚任广东省教育厅课长、广东工商业局局长,陈太龙任广西省众议院议员,马君武任广西省省长等。梁启超、潘之博、马君武等分别入段祺瑞、冯国璋、孙中山府,1917年梁启超任段氏内阁财政总长,1915年,潘之博入冯国璋府,1912年马君武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参议院参议员,1917年任孙中山军政府的交通部长。与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紧密关联的康门弟子入幕,这种在军事斗争中生存的方式是与这批文人出身的康门弟子不相适应的,故1920年以后,梁启超、马君武等纷纷回归书斋讲坛。

**2. 讲学生涯。**广东学人既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也走出国门,在日本、美国、印尼、加拿大、新加坡、缅甸、吉隆坡等创办新式学堂,以宣扬维新思想,始于康有为及其门人,并以1899年为高峰,延至20世纪30年代,这是康门弟子对广东学人讲学生涯的大逆转。据笔者研阅,康门师徒主办的学校38个,除若干未明学校名称以外,广东有万木草堂、东莞学堂、南强公学、南强公学附属幼儿园、党是草堂、颖川丙等女学6所,上海有万木草堂小学、女子学堂、天游学院3所,广西有国民学校、广仁学堂2所,湖南、江苏、北京分别有时务学堂、暨南学堂、孔教大学,澳门有东文学校、湘父学塾、孔圣堂、子褒学堂4所,香港有广东公学、孔教学校、子褒学院、华夏学院4所,日本有大同学校、商业学校、同文学校、横滨女校、大同高等学堂5所,美国有干城学校、爱国学堂、明伦学校3所,印尼有妇孺学堂、中西小学堂2所,加拿大、新加坡、缅甸、吉隆坡分别有域多利义学、女童学校、辅仁学校、坤在学校。无论是宣扬维新思想,还是力倡以孔学为教,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欧榭甲、徐勤、陈焕章、卢子骏、陈和泽等康门弟子就是以学校阵地,并将传统学校拓展至女学、女童学校、幼儿园、小学、中西小学等,从内容到形式均使广东学人的讲学生涯产生近代蜕变。

此外,郑洪年一生则专注于发展华侨教育事业,曾任暨南大学校长。唐以修、龙应中、梁启勋、李微尘等是20世纪60、70年代去世的康门弟子。以上诸人多从事教育工作,如天游学院门人唐以修长期从事文教工作,龙应中执教南京中央大学、广西大学,梁启勋任青岛大学国文系教授。从办新式学堂到任教于新式学堂,以上诸人延续康门弟子以新学兴国的时代使命。

**3. 办学会、办报、办企业与书局。**真正掀起广东近代学人办学会、办报、办书局与实业高潮的是康门师徒。据笔者研阅,康门师徒主办学会18个,其中北京5个:京师强学会、粤学会、经济学会、知耻会、保国会,广东3个:不缠足会、戒缠足会、圣学会,上海3个:上海强学会、不缠足总会、医学善会,广西1个:圣学会,以上12个学会均产生于1895—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1898—1906年,康门弟子在日本、美国办学会5个:祀孔会、戒鸦片烟会、大同志学会、爱国学社、新会国文学社。1913年,康门弟子在曲阜办孔教会。无论是指斥缠足、鸦片、不知耻,还是直接宣扬强学、圣学、医学、保国、爱国与孔教,从两广到上海,到日、美,到山东,以上学会都

彰显了康门师徒的“新民”足迹,表达了他们的维新信念。

康门师徒主办报刊 51 个,其中有具体地点的 50 个,上海 13 个:强学报、时务报、时报、国风报、孔教会杂志、不忍杂志、雷风杂志、学艺杂志、学术世界、南洋研究、京沪周报、大英日报,北京 5 个: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国民公报、唯一日报、经世报,广东 3 个:岭海报、国事日报、嘻笑报,广西 3 个:广仁报、广西新报、梧州日报,湖南 2 个:湘学新报、湘报,浙江 1 个:青年日报,香港 5 个:商报、平民周刊、丙寅杂志、中国晚报、热风,澳门 1 个:知新报,美国 10 个:文兴日报、新中国报、日新报、世界报、维新报、大同日报、时铎杂志、世界日报、纽约公报、人道周刊,日本 5 个: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政论、东亚报,新加坡 2 个:南洋总汇报、南洋商报。与办学会集中于维新变法期间不同,康门师徒办报集中于戊戌政变以后,从北京、上海、湖南、两广、澳门辐射至日本、美国、新加坡。1913 年返国后,康门师徒继续在上海、长沙、北京与香港等地办报。康门师徒办报不仅有序地呈现于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至康有为去世的每一个 10 年,而且在康有为去世以后,伍庄、陈柱、李微尘等门人在上海、三藩市、洛杉矶、旧金山、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办报,故持续近半个世纪以来,办报成为康门弟子宣扬维新思想、参与时政的重要方式。

康门师徒办企业与书局 15 个,上海 2 个:大同译书局、广智书局,江苏 1 个:述农公司,广西 1 个:振华公司,香港 5 个:中国商务公司、中华酒店、华益银行、渔票公司、徐闻公司,墨西哥 2 个:华墨银行、电车公司,美国 2 个:华美银行、琼彩楼,日本 1 个:横滨译书局,南洋 1 个:新开美。除大同译书局以外,康门师徒主办的企业与书局都产生于戊戌政变以后,且多以香港、纽约、横滨、南洋、墨西哥、芝加哥等为主,国内则集中于上海、广西、江苏。其经营范围则以酒店、银行、书局为主,且多经营不善而暴露文人经商的不足。但康门弟子仍然出现伍庄、汤觉顿等经济实业家,与此同时,这种与文人身份不相符的商人行为体现了康门弟子善于抓住机遇、勇于自我挑战的精神,属于广东知识分子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课。它与办报、办学会与办学校一起,在北上与南下、出国与归国之间,共同书写康门弟子不平凡的生命轨迹,此即广东学人勇闯的近代化足迹。

一方面,戊戌政变后,康门弟子至少有 60 人逃亡国外。如此大规模离开国土,使广东籍康门弟子

就是一个异类的存在。另一方面,旨在从事维新事业,康门师徒的新式仕宦、讲学生涯、办学会、办报刊、办企业与书局等都所践履的就是一个几乎全新的事业。纵然康有为肆意扼杀梁启超、欧榘甲等欲与孙中山实行合作的意图,使康门弟子未能与时俱进,使昔日代表广东近代学人先进方向的万木草堂仅具有半截子的近代性,但正是这半截子的近代化充分显示康门弟子就是广东学人近代转型的缩影。

### 三、知识结构与著述遗存

康有为是以体用关系应对“西学东渐”与宣传维新变法的,加之维新事业将康门弟子紧密地拴在了一起,故中西学结合成为康门弟子知识结构不变的中心。康门弟子既没有出现朱氏门人、简氏门人无视西学与留住中学的中西新旧学对立的知识结构,也没有重走康有为以颠覆儒学传统而实现中西学结合的做法,他们旨在关注儒学面临消亡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留住中学,也从自身做起,树立中西学结合的范式,由此也影响康门弟子的著述遗存。

#### (一)知识结构

适应新学与留住旧学、中西学结合是康门弟子呈现的 2 种知识结构,迥异于朱氏门人、简氏门人出现的中西学对立观。

1. 适应新学,留住旧学。经典教材化、儒学通俗化、儒学纯学术化是康门弟子适应新学与留住旧学的 3 种方式。

陈焕章、张扶万等是康门弟子实现经典教材化的代表。1902 年、1923 年、1929 年,陈焕章先后任广州时敏学堂教员与监督、在北京创立孔教大学与担任校长、在香港创办孔教学院与自任院长,留下《儒行浅解》《今文诗经读本》《今文尚书读本》等著述,很有可能就是陈焕章的课堂讲义。张扶万在维新变法失败后,返乡陕西创办文昌学校,讲学横渠书院,有“关中淹博士”之誉。张扶万学识宏博,长于经史,有《礼记今释》《诗经今释》《尚书今释》《公羊今释》等经学著述,属于经学教材化的产物。

卢子骏、陈荣袞均专注童蒙教育、妇孺教育,是康门弟子以儒学通俗化的方式留住旧学的代表人物。在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期间,卢子骏在康有为的指引下,编成《妇孺韵语》《童蒙三字书》《童蒙四字书》《童蒙五字书》,使儿童、妇女易于学习,更加适合学校授课。陈荣袞终其一生致力于妇女教育、通俗化教育、小学教育与平民教育,由此撰写《妇孺新读本》《妇孺三字书》《妇孺四字书》《妇孺五字书》《妇孺译文》等一批与此相适应的教材。

与乃师并称康梁的梁启超不仅全面参与维新

变法的整个过程,以办学会、报刊、学校等形式宣扬维新思想,而且,梁启超成功发动中国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专注于中国史学、儒学、子学与文学研究,提出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在整个中国古代,中国旧史都是儒学的工具,故梁启超启引的是兼及中国史学、儒学的纯学术研究之路。

**2. 中西学结合。**学习外语,翻译外国著述,是康门弟子体现中西学结合的主要形式。它与适应新学,留住旧学一起,属于广东学人知识结构近代转型的主要形式。

陈焕章、马君武、伦明、陈柱、张伯桢、罗普等是学习英文、法文、日文的康门弟子,正是这种语言结构的变化,广东近代学人踏出中西学结合的关键一步。1910年陈焕章用英文撰写《孔门理财学》,倡明圣学,1913年创办《孔教会杂志》,1929年在香港办孔教学院。1901年马君武入上海法国人办的震旦学院学习法文,开始翻译《法兰西革命史》《代数学》《物种起源》《平面几何学》《矿物学》等著述。伦明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旧班第二类,分科习英文,积极与以修《四库全书》,成为著名的目录学家。张伯桢、罗普留学日本,张伯桢著《法律学》,罗普任职广东财政厅长等,陈柱则自任广西梧州中学校长,亲自上国文、数学、英语等课程。

## (二)著述遗存

即使康有为的著述遗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承朱次琦以经学、史学、理学为主的格局,但表面相同的著述架构下,呈现的是康有为以中西新旧学结合启引的广东学术近代转型的足迹。中西新旧学结合在康门弟子手中运用更加纯熟,他们不仅沿承康有为开具的中西学结合的路径,而且拓展中学研究的门类,使本来作为经学附庸的史学、文学实现独立,使广东学术近代转型实现一个时代的终结。

**1. 经学类。**康门弟子经学类著述12种:伍庄《尚书源流》《讲易记》《诗之人生观》、《经学通论》《国学概论》,陈焕章《今文诗经读本》《今文尚书读本》,张扶万《礼记今释》《诗经今释》《尚书今释》《公羊今释》,赵必振《国学概论》。以上著述均见于《述略》。

康门弟子不复依傍于经典,以出其笔下的经学著述既回归经学本身,也实现经典教材化,使经学与崭新的时代相接轨,推动广东后经学时代的到来。

**2. 孔学、子学、小学类。**朱、简都以孔学为宗而反对子学、重视小学,康门弟子则三者兼重。康门弟子孔学类著述5种:陈焕章《孔教经世法》《孔教

论》《孔教教规》《孔门理财学》,梁启超《孔子》。康门弟子子学类著述8种:陈柱《墨子闲话补注》《墨子十论》《子二十六论》,曹硕《大易道德经说微篇》,梁启超《老子哲学》《墨子学说》《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康门弟子小学类著述2种:陈柱《小学考据》《守玄阁文字学》。

康门弟子沿承康有为对于孔学的多义理解与启引的子学大解放,既将孔学宗教化,将孔学纯学术化,也深化子学的纯学术研究,以此体现广东学人实现学术近代转型的诸种努力。

**3. 史学、理学类。**康门弟子史学类著述29种:伍庄《中国最近百年史纲》《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辛亥革命信史》,陈焕章《孔教史》,罗惇融《中英滇案交涉本末》《中俄伊犁交涉本末》《太平天国战记》《中日兵事本末》《藏事纪略》《割台记》《庚子国为记》,赵必振《自立会纪事史料》《自立会人物考增补》,欧榭甲《新广东》,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雅典小史》《朝鲜亡国史略》《越南小志》《越南亡国史》《日本吞并朝鲜记》《中国国债史》《欧洲战役史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张扶万《颜孝学考》《阿母河记》《唐代日本人来往长安考》《蔡秦疆域志补正》。

康门弟子理学类著述2种:伍庄《论语读法》《孟子读法》,见于《述略》。

康门弟子的理学著述殊非服务于科举考试,或将近世史事写入笔端,或提出史学的研究方法,康门弟子使以独立身份出现的史学的治世功能延伸到任何一个时代。

**4. 志书类。**康门弟子志书类6种:陈焕章《高要县志》、林绳武《钦县志》、张扶万《刘古愚年谱》《太史公年谱》、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辛稼轩先生年谱》。梁启超二著收入中华书局1986年版《饮冰室合集》,康门弟子余下4种志书见于《述略》。康门弟子是将志书与封建统治相分离,由此使志书实现学术研究的独立。

**5. 文学类。**康门弟子文学类著述43种:康门弟子诗集有韩文举《树园先生遗集》、伍庄《梦蝶诗存》、罗惇融《瘦庵诗集》、伦明《伦哲如诗稿》、龚寿昌《眉龠诗草对联汇编》、郑洪年《橐园诗稿》、陈涛《审安斋诗集》、刘翰棻《刘翰棻诗残稿》、罗惇融《三山移诗存》、林旭《晚翠轩诗集》、邱炜菱《邱园诗集》《嘯虹生诗集》、易宗夔《横海楼诗集》13种,以上著述均见《述略》。康门弟子文集有梁朝杰《出云馆海外文集》、伍庄《梦蝶文存》、郑洪年《郑洪年华侨教育言论集》、罗惇融《羯蒙老人随笔》、麦仲华《戊戌

奏稿》《皇朝经世文新编》、《戊戌政变记》、易宗夔《横海楼文集》8种,均见于《述略》。康门弟子诗话有龚寿昌《八桂诗话》、罗惇融《三山箴诗学浅说》、梁启超《饮冰室诗话》3种。康门弟子词集有麦孟华《蛻庵词》1种。康门弟子诗文合集有梁朝杰《梁氏小雅》、马君武《马君武诗文集》、张伯桢《张篁溪遗稿》、曹毅《虚白斋诗文集》4种。康门弟子诗词合集有潘之博、麦孟华《粤两生集》、梁启超《梁启超诗词全注》、梁朝杰《游美诗词存稿》、陈焕章《诚默斋诗词稿》4种。康门弟子词文合集有林旭《长短句及杂文集》1种。康门弟子戏剧有罗惇融《文姬归汉》《红拂传》《孔雀东南飞》、许之衡《重订胭脂传奇》4种。康门弟子小说有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佳人奇遇记》、罗普《东欧女豪杰》3种。康门弟子日记、游记类有欧榭甲《环球日记》、梁启超《新大陆游记》2种。

即使文学的旧学特色没有经学、史学、理学如此浓厚,但是,与简氏门人一致的经世之文就是康门弟子的文学特色,从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新大陆游记》中倡导的新派诗、政治小说,就可以看出儒家诗学的淡出与新体诗、新小说兴起的足迹。

6. 教科书、译著、心理学、学术史。康门弟子教科书12种:崔成达《虚字作法》,卢子骏《童蒙三字书》《童蒙四字书》《童蒙五字书》《妇孺韵语》、陈焕章《儒学浅解》,陈荣衮《妇孺新读本》《妇孺三字书》《妇孺四字书》《妇孺五字书》《妇孺译文》,易宗夔《世界历史教科书》,以上著述均见于《述略》。

康门弟子译著15种:马君武《法兰西革命史》《代数学》《物种起源》《平面几何学》《矿物学》,麦鼎华《政治泛论》《中等教育论理学》《埃及近世史》《欧洲十九世纪史》《今世欧洲外交史》《俄罗斯史》,赵

必振《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维新慷慨史》《日本人权发达史》。以上著述见于《述略》。

康门弟子心理学著述1种:梁启勋《社会心理之分析》,见于《述略》。

康门弟子学术史著述12种:陈柱《中国散文史》,有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许之衡《曲律易知》,有1922年刻本。许之衡《声律学》《戏曲史》,有1924—1925年刻本。许之衡《词曲研究》,有辅仁大学公记印书局1933年版。梁启勋《词学》《中国韵文概论》,见于《述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先秦政治思想史》,收入中华书局1986年版《饮冰室合集》。

以上著述是西学东渐与“癸卯学制”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产物,是康门弟子对崭新的时代学术的一种适应与反射。它与康门弟子留下的嬗变广东经学、孔学、子学、史学、理学、谱学传统的著述一起,共同推动广东学术的近代转型。

## [参 考 文 献]

- [1] 苏云峰. 康有为主持下的万木草堂[J].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72, (3).
- [2] 陈汉才. 康门弟子述略[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 [3] 王明德. 草堂万木森变法维新政——康有为和他的弟子[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 闫卫平)

## The Disciples of Kang Youwei and Writing Remains

ZHANG Wen-hua

(The School of Humanity and Law, Guangdong Petrochemical College, Maoming 52500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to correct some errors in the Description of Kang Youwei's Disciples an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its related descrip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not only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geographical origin, the reform cause,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he writing remains of Kang Youwei's disciples, but also compares his disciples with Jian's pupil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 order to find specific path to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cholars and academic in Guangdong and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Kang Youwei's disciple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Key words:** Kang Youwei; Disciples of Kang Youwei; Geographical Origin; Knowledge Structure; Writing Remains